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八八期 ——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7d)

【往事追忆】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	钱文军
【史海钩沉】何家栋与迄今未了的小说《刘志丹》案	高 瑜
【千秋功罪】阎红彦的最后岁月	李 原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追忆】

〔编者按：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时训斥：“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本文是这次会议的亲历者的回忆。〕

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

• 钱文军 •

1968年7月中旬，接到军管会通知，我们乘坐据说是周恩来的专机飞往北京，接着住进了解放军政治学院。自由了两三天，接着就隔离在这里：不准外出，不准串联，不准外人来探访等等。

大约在7月16日，白鉴平过来通知我去他的房间，到那里发现已经坐了许多人。高天寿正在说什么。大意是：清华的蒯大富召开座谈会，邀请了广东旗派、青海八一八、徐海踢派、四川反到底等各地造反派主要负责人，希望我们也去参加。似乎高天寿介绍说，已经开了一天，各地造反派有许多经验都不错，听了很有启发。白希望我能一同参加，我表示没多大兴趣，因为我根本看不起蒯大富，从3月到5月初，我在北京呆了差不多两个月，跑过几趟清华，眼看着这家伙俨然中央领导人似的，不可一世。再说，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别忘了这个“条件”，任何时候，毛主席要我们死我们就不得不死。

白鉴平笑道：“你别那么悲观好不好？否定了我们造反派也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绝对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你只管放宽心。”高天寿解释说，现在全国的老造反派都处于受压状态，北京的“天派”同情各地老造反派的遭遇，需要收集一些具体情况，通过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把各地情况报告给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以改变这个状态。我觉得这些意见实在太天真了，其实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各地的实情，说不定正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既否定造反派，又肯定文化大革命。

争论很厉害，最后白鉴平总结道：那你能怎么办？力争一下总比不争的好。我们什么东西也不向中央反映，别人可没闲着，最后还不是等死？遂统一意见，管他三七二十一，去听听也好。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几个从政治学院东北角爬围墙出去，到了魏公庄，高天寿等在那里。他不是这次代表团成员，不能住进政治学院。高领着我们搭公共汽车到了清华。

清华园里乱七八糟，比几个月前我来时，武斗气氛浓烈得多了。蒯大富看样子没什么优势，“四一四”的广播喇叭显然更信心十足，我不禁觉得好笑，对白鉴平说：老蒯像蒋介石迁都广州时一样了。白鉴平说：你他妈的这把嘴就是不饶人，哪有那么严重？他的话还没落音，高天寿发话了，他叫我们别挤在一起走，分开点距离，不远不近跟着他。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来找亲戚朋友的，千万别说来开会。我抓住他的交代马上驳斥白鉴平，这次白也笑了，说堂堂蒯大司令，在清华也成了“地下党”，是有点不争气。然后又讥笑清华的武斗工事，跟我们去年刚开始武斗时水平差不多。七转八转，人都快转晕了，高天寿才找到地方，受了一通盘问，终于进了会场。

会议已经开始，我们属于迟到的。一位据说是蒯大富秘书的角色，打着官腔批评我们迟到。当时正好有一位老兄在发言，听起来像是吉林的。我打量一下会场，大约四五十号人，看上去都面露忧愁与冤屈。想起五月份我从北京回广西，进入广西就一路被搜捕，而一旦被抓住就意味着死亡。于是想到，他们回去也许面临同样下场，不免有一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不知存在于何处，或许，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残酷的返祖现象。广西的事实告诉我，一切武斗和野蛮行径，都是“三支两军”带来的，文革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使林彪和他领导的军队执掌政权，全国所有的“新生革命政权”都变成了军人政权，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我确实对这些“凄凄惨惨戚戚”的哀怨不感兴趣。并没有先知先觉，而是被形势所迫。1967年8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央表态：广西“422”是造反派！于是我们全都欣喜若狂。要知道这个表态如此及时，恰在我们被打得眼看就要招架不住的时候，也许周恩来是刻意安排在这个时候表态的。于是进攻立即停止了，而我们还在很长时间内振作不起来。

等待中央正式文件下达便成了遥遥无期的事情，倒是迎来了野战军——55军的亮相支持。这个军的挂名军长是陈明仁，国民党起义将领自然也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副军长孙凤章，据说是海南登陆战的总指挥。不过副参谋长曹银仲却是地道的“渡海先锋营”营长，我们很快就熟悉起来。自打“三支两军”以来，我们一直是军方的眼中钉、肉中刺，而我们也把军方看成压迫者。现在忽然得到真正的解放军——野战军的支持，这才感到什么叫做“子弟兵”，那些地方部队和军区之类，不过只是穿着军装的官僚而已。

与我们的急切等待相反，广西联指却在8·24表态当夜刷出大标语：“周恩来八·二四表

态罪该万死!”接着在第二天大肆散发号外:“余立金同志传达林副统帅指示:‘广西问题要重新研究,广西联指是革命组织。’”如果我们贴反对周恩来的什么标语,那么肯定会被军管会当成“反革命事件”来处理。但联指刷这样的大标语,却没人追究。我曾经问过曹副参谋长,他只是苦笑,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好对我解释。

然后就是“九·五”命令发布。恰好那一天,我和莫兆明连夜开车到来宾县,那里的“造反大军”组织负责人来报告,来宾县人武部有枪支弹药。当时部队毫无作为,联指的反调越唱越高,武器也越来越多。甚至还主动发起短暂的进攻。我们也在四处搜罗武器,抢枪就如同打土豪、分田地般合理。但我决定先去落实情况。车行到半路,遇到柳州市的两部汽车,装满了人,不时还对天放两枪,不知是示威还是取乐。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哪一派的。

到来宾县找到报信的人,他紧张地告诉我们,柳州造反大军已经来抢过了,弄走了一些旧武器。据武装部内线报告,中央有一个新命令,可以对抢枪的开火。是广西军区电话传达的,还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武装部已经把新式武器取了出来,并且设了埋伏,再去抢枪就会被伏击。于是我们死了心并赶紧返回柳州,必须马上制止再有人来抢枪。天亮时回到学校,告诉我们的“二把手”,命令一律不许再去任何地方抢枪了,看来中央已经改变政策,不如静待变化。如果这个命令是一视同仁的,倒不失为好事,因为我们的武器实在比对方少得可怜,干脆两派都缴枪还更有利一些。“二把手”去传达命令,我就睡觉去了。

中午被叫醒,说柳州市学生组织“柳江风雷”去来宾抢枪,我们的“毛利”和方天行也跟去了,结果中了埋伏,死了十几个人。不知他俩是死是活。我立即大发雷霆,责怪“二把手”没有很好地下达命令。最后,“毛利”回来了,方天行成了15具尸体中的一具。这15个死去的学生,最大的也就是方天行,老初二的。其余全部都是老初一的。曹副参谋长看着从汽车上卸下这些尸体,铁青着脸说了一句:“都是些孩子!”

曹原来是解放海南岛时的“渡海先锋营”营长,因为营里牺牲太大,一怒之下枪毙了俘虏,受了处分。而柳州市这些死难孩子的家长们,居然没有什么人嚎啕大哭的,那种漠然的神态给我留下终身印象。就像野兽看待自己死去的孩子一样。我随后登门拜访方天行的父母,原本打算安慰他们,谁知道两位家长同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麻木地呆坐着。当我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同意埋在我们校园里时,方伯伯道:“随便吧。”柳州市里来的家长们也同样如此。于是我让铁路车辆段用修车皮的东北松木板制作了15具棺木,把他们安葬在我们学校的荒地里。我仔细询问了“毛利”,他显然受到太大的惊吓,神志仍然不很清醒。问了半天才弄清楚,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遇到埋伏,而且就在武装部的院子里,篮球场上。自己也闹不清是怎样从机枪、冲锋枪的扫射中逃出来的,幸运地成为仅存的三个人之一。

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怎么会突然蜕变成这样?我想了很久,似乎明白了一点:在政治权力面前,只有民主的方式才是文明的。当民主不存在的情况下,人性便会让位于兽性。

再接着,传来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其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特别是后一段:“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觉得这个最新最高指示确实是来得英明,问题是加上如此之多的限制性定语,会使它大打折扣。特别是“革命的原则”是什么?谁都可以任意解释。

于是形势迫使我们思索。“肖猴子”干脆提出:“读一点没经别人解释过的马列主义。”的口号,社会上也似乎平和了许多,接着要交枪,许多人想不通,我便四出动员。终于交完了,只

有“老虾”把武汉“钢二司”作战部长送给我的那支勃郎宁小手枪藏了起来。不过那支枪确实漂亮，简直就是工艺品，说它是武器真有点过分。我也就懒得追究了。

几乎是刚把枪交完，县份就开始打起来，接着变成屠杀。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难民开始涌入城市，传说越来越恐怖，有的地方连婴儿也杀。军区与革筹小组说是谣言。但我们知道，没有残酷的屠杀，不可能有那么多老百姓愿意背井离乡。历史证明，那些屠杀都是真的。例如1983年中央处遗工作组编写的《广西文革大事记》里，1967年11月30日的记载便说：“本月，全区各地‘联指’乱杀人现象日益严重。容县民兵在11月内，就打死地、富分子和一般群众以及‘四二二’成员六十九人。”更早，1967年10月1日的记载：“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后果严重。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七十六人。”并详细记载了坑杀地主刚一岁的孙子的过程。

我们亲自经历了广西军区与广西革筹“一边做婊子，一边立牌坊”的历程。明明是他们操纵“联指”，把全广西的农村民兵都变成“联指”，默许甚至指使他们屠杀。另一方面却说成“两派不断发生武斗，一些干部群众被杀害”；更严重的是，他们甚至伪造证据，无中生有地制造如“上石农总”、“反共救国团”之类冤案假案，煽动屠杀气氛。最后，在1968年3月，调走野战军，派部队直接参加屠杀群众的“武装围剿”行动。

我们心中曾经高尚的革命，一下子被残酷而且无耻的政治斗争现实粉碎了。原来革命也是卑鄙的！更令我们伤心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心目中的崇高领导，如今却成了泥菩萨！当他们不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死活是无所谓的。而且火上浇油地宣布贺希明、霍泛、谢王岗、袁家柯这四名支持“422”的领导干部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柳州铁路局局长张炎也被康生定性为“坏人”。我们于是认定，广西的屠杀是北京默许的！统治需要奴才而不需要造反派。特别是康生接见云南赵健民的那个讲话，使我们看到一副赤裸裸的无赖嘴脸，“大党阀”就成了康生的代号。于是在我们学校，中央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被我们骂过，老毛也没幸免。

我们还反思文革，结论是：彻底搞错了！现在需要找替罪羊，不光是广西“422”，全国的造反派都会成为替罪羊。这几个月的校园里，内部讨论、争论、辩论不绝于耳，但思考的结果是大家都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湖南传来《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我们虽然有不同看法，却一致认为此文振聋发聩，况且还是我们的同龄人写的，更多了几分自豪与鞭策。最终，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自己保卫自己，中央是不会理会我们的死活的。老实说，到这时，那句曾经是我们神圣誓言的：“誓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已经成了笑谈。

以这样一种心态，参加清华的“诉苦会”，我们与那些依旧痴情不改的与会者便隔了一个层次。因为“七三布告”是对广西来的，在大家的要求下，白鉴平十分得意地即席发言。他介绍了我们被追杀的困境：整个柳州市我们只剩下一条街道，与铁路的地盘还隔着“联指”的据点。各地农民在武装部的率领下，领着津贴进攻我们。基本上离被消灭只有“五十米”的距离。我知道这小子借用毛批评周的话来讲的。

然后我们自己救自己，毫不犹豫地学习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指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打出一片天地。广西鹿寨县武装部长张春峰亲自率领武装基干民兵进攻我们，被击毙在战场上。“联指”逃到柳北，我们占领了柳州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盘，然后我们如何组织生产、生活、治安等等。

他的发言博得阵阵掌声，那些个刚才还要死不活的各地造反派都激动不已，纷纷表示要向柳州的造反大军学习。这天的会议不知怎么结束的。因为我已经跑出去看清华的“小儿科”级别的武斗去了。不记得什么时候，会议结束。说是被清华“四一四”发现了，可能不安全。并

已经决定明天到北航继续开。于是我们几个离开了清华，有人提议去吃烤鸭，白鉴平说那玩艺远不及广西的烧鸭好吃，于是我们到展览馆餐厅吃饭。记得一个细节：有一个菜叫“拔丝肉块”，服务员先上了一大碗凉开水，一个小子夸奖之后便把它喝下去了。接着上来那碗肉块，黄澄澄的，十分诱人。柳州一中的明在胜夹起一块便往嘴里送。然后被烫得乱哼，却又吞不下去吐不出来，粘在牙上，急得用手去抠。我们全都笑得前仰后合，一群南方土佬！

次日到北航，这里一片歌舞升平，丝毫没有两派的影子。会议是由韩爱晶的秘书主持，韩据说到北戴河疗养去了。我悄悄对白鉴平说：你知道什么叫革命吗？革命就是新的官僚取代老的官僚。白鉴平笑罢说：你哪来那么多谬论？然后那些个哭丧脸们纷纷表示要向柳州的造反派学习。昨天还在诉苦的青海造反派，发誓要立即返回，用柳州的经验武装头脑，组织大家干。还有人要求白鉴平把柳州的经验写出来，印成册，发给大家学习。

乱纷纷你方说罢我又开场，那个号称韩爱晶秘书的制止大家，会场安静下来。他摆出中央首长接见的架势，打起了官腔，说过些报纸上登滥了的言辞之后，要求大家注意：不但要抓紧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要注意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定要看准，要跟对人云云。

我听了便对白鉴平道：狗屁不通的理论。什么路线、司令部的，难道这也分得开？什么跟对人不对人的，庸俗不堪！裙带关系也成了革命道理，照他这么说，狗是最革命的，永远不会跟错人。白鉴平忍不住笑出声来，惹得整个会场的目光都转过来了。那位秘书大人似乎感觉我们对他不恭，很快打住话头，叫大家继续讨论。

一个辽宁的老造提议：建立全国老造反派联络站，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马上有人反对，称五大领袖已经分成天派地派。又有人纠正道，天派地派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再有人又反对，清华不是打起来了吗？接着有人纠正说，“四一四”是老保翻天，算不得造反派。总之，会场始终乱哄哄的。

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有人提出，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是中央禁止的。另有人建议，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批准。还有人说不会批，不如先成立起来，等中央知道了再申报。莫衷一是。没料到在“7.25”接见里，变成这个会被知道了，赶紧报告之类话语。歪曲的武器确实很好用，康生也算大师之一。

我懒得再听下去，就出去找卫生间。没料到在走廊里遇见我们学校考上北航的学长，寒暄过后，我们下了楼，到停机坪看那几架破飞机，我这次才发现，以前的飞机居然还有用布蒙皮的。学长问我何以不进去开会，我说那里大部分都是些期望革命成功好封妻荫子的，本人没有那种雅兴，也不想继续听他们胡说八道。于是我们就在北航到处乱转悠，甚至连吃饭也是在北航学生食堂里吃的，下午快下班时分就径自返回政治干校，白鉴平他们开到何时我也不清楚。

顶多第三天，学习班里的军代表找我，说要了解北航开会的情况。对于早就有预感，知道军区、革筹意欲对我们找茬的我来说，这并非稀奇事。于是简单说了开会的情况。没料到他们居然要我写出书面交代，本人拒绝了。理由是他们绝对没料到的：本人不识字，不会写。那个师政委王国禄先生大发雷霆：“《今日的‘哥达纲领’》你都能写，这个材料你不会写？”马上被我抓住把柄：“王政委，你们不是报告说有黑教师爷吗？康老说：中学生写不出来。你跟康老唱反调？”于是争论了一通，不欢而散。他威胁我几句转身走了。

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血来潮忽然有了诗兴，于是得了《卜算子·军代表》：“肥脸泛油波，瘦眼刻奸笑。休道穷人闹减租，成天喊又叫。叫叫又何妨，时候还没到；待到深秋算账时，自有镢和铐！”我正把它写下来，再对一下平仄关系，和我住同一间房的独立师金营长进

来了，他也是个胖子。看了之后说：“妈的，你小子不是骂我吧？”我与之关系尚可，也笑道：“骂你又怎的？不会多一个罪状吧！”他认真看了看，然后叹口气说：“小伙子，你怪聪明的。不过，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好的，可别被老虎吃了！”我听出来他话中有话，急忙向他打听。他说，北航这个会，中央已经知道了。定性为“黑会”。事情比你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然后解嘲说：“你在这学习班里好好的，吃得好睡得好，偏要跑出去开什么会。什么会开了都没用，你们年轻，还没闹明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别胡闹，闹事的都不会有好果子吃，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

当天晚上，学习班几个领导人把我叫到一间会客室，正式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北航黑会有黑手，必须认真查出来。然后苦口婆心劝说，认为我不过是个受蒙蔽的角色，只要把情况说清楚，就没事了。然后告诉我，你不说不等于组织上不知道，别人会说。接着有似乎故意地透露一句：“要成立全国性组织，想干什么？取代共产党不成？”我马上明白，又一个欲加之罪来了！也很清楚，抵抗是毫无意义的。简单说了下过程。还是那位王政委，几乎跳起来吼道：干什么？你大老远跑到清华、北航，就为了看工事、看飞机？

我望着他那激动的样子，说：“王政委，别激动。你那么胖，小心血压高。”他还想发作，一个我从未见过、年纪并不大的便衣人物向他摆摆手，于是他乖乖地坐下了。这个一口京腔的精干人物很和气地说：“你也别有什么顾虑，更别瞎编。实事求是，有什么是什么，我们今天是代表中央文革找你了解情况的。这个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暂时还没有定性。所以，请你协助组织上搞清楚。”气氛缓和之后，我依旧一推六二五，只说没心思听那些诉苦，白鉴平说柳州武斗的事我也懒得听，所以打瞌睡，接着干脆溜了号。最后，他们看来也无奈，只好叫我写。我写了一张信纸，于是结束。

等我睡了一觉，金营长才回来。我问他，上哪儿喝酒去了？喝到现在。他叹口气说：“你呀，专门给自己找麻烦，何苦来呢？”我问他又有什么麻烦了？他不说话，随口道：“睡觉。明天早起再说。”

次日早晨，我照旧蹲在厕所里躲过早请示和跳忠字舞。等到开始学习，王国祿在大会宣布：王反修、李振岭还有我，从今天开始隔离反省。不许外出，也不参加大班学习。留在宿舍里单独写交代材料。

又开始一种新生活。人的阅历是从新生活开始，到它变成旧生活结束的。

没过几天，我们三个都恢复了大班活动。似乎没什么事了。接着宣布将有重要活动，可能是毛主席接见。规定每天都必须做好准备，除毛主席语录、手绢、一角钱纸币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许带。随时活动随时通知，不准缺席。老实说，已经没兴趣受那个老人接见了，但却必须装出万分激动的样子。革命也需要形式主义。

算起来应该是7月24日，下午四点，等了几天的活动终于来了。紧急集合哨声响起，然后提前吃晚饭，宣布说要过半夜，所以尽量吃饱些。菜特别好，那个油炸大对虾至今还能记得。吃饱之后等到六点，来了几十辆军用解放牌卡车，都有棚。上车以后就在北京市区兜圈子，根本不走大道，例如长安街。等到停车下来一看，怎么北京还有一座人民大会堂，门前却没有天安门广场？晕乎了一阵才明白，这是人民大会堂的西门。

进入这里对于我已经不是一两次，去年11月总理接见，在西花厅里斗胆向他提了个要求：我们有许多人到北京来，希望批准参观人民大会堂和部分完工的北京地铁。总理非常爽快，马上答应了。还说：“我给你们提了那么多要求，你们都答应了。你们提一个要求我还能不答应？”

于是总理派来大客车，西去苹果园，乘坐施工用的车厢走了几个建好的站。上到地面客车已经在等候，于是又坐到人民大会堂。参观中我们的一个美人同学被地毯绊了一跤，她恰好没有外号，于是被叫做“跛子”，一直叫到现在。

现在却落到如此地步，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我暗自想，如果今晚向他提出这个要求，恐怕得挨骂。至少不会那么乐呵呵地答应。到里边才知道为什么准许带一角钱纸币：原来这里有许多无人售货台，茶叶、糖之类，每份都是一角钱。等到11点多，仍然毫无动静。继续等了一会，终于来了。看过去阵势够排场的，除了毛、林、江以及几个管经济的副总理，其他领导人全都到了。

接见开始，康生首先发难，矛头直接指向“北航黑会”。点了广西区党校的朱仁，此君我从未听说过，现在却成了主持人。实际上他只是在白鉴平发言之后，广西出了小名才跳出来的，我参加了两天会，竟然不知道他给算成主持人了。康生一顿炮轰，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账会。来之前王反修准备告状材料，我奉劝他算了，只带耳朵去，没人会听你告状的。但会议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厉，确实没准备。

整个主席台上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四二二”。后来中央工作组调查核实，杀人放火全部都是“联指”的“业绩”，广西军区与革筹造谣我们已经习惯。这些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居然也不过如此，怎么说都感到意外。后来军区、革筹整理的接见记录，完全删去了我们的辩解。其实，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也根本不许我们辩解。我终于明白“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

事情很快就降临到我的头上。先是那个吴某某，他站起来说：“报告总理，他爸爸是国民党武汉市党部书记。”这个谣言造得你根本没法辩解，康生连话也不许我说，马上定性：“你看看，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又马上有人揭发：“他还养了一条狗，给狗起名叫‘黄永胜’。”黄总长几乎跳起来，指着我叫道：“我看你这个样子就不是好人！”谢富治接口：“送我那里去。”我当时完全失去了思维能力，不知该从何说起。只是在此时，周恩来也许想起了什么，说道：“他是中学生，属于认识问题。”据说，因为这句话，后来救了我一命。

这个吴某某，长我两、三岁。他父亲过世早，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全凭着我父亲为之争取，得了抚恤金。而他本人又读不进书，初中毕业便参加铁路工作。我母亲几乎常到他母亲那里搞一点小恩小惠的，如今他跑到这里来诬告我的父亲。我竭力想看他一眼，也许他自己觉得理亏，始终没把脸转到我这个方向来。于是，我似乎明白，这是导演好的一出闹剧，他或许只是奉命行事罢了。只是苦了他那个老娘，后来一再乞求我母亲原谅。而我，后来与所有对立派的熟人继续融洽地交往甚至还有的成为好朋友，惟一不理的便是这个我从小喊他“吴哥”的，直至今天。

是非是无法申辩的。我们被扣上“中断铁路运输”的罪名，其实这个铁路运输是谁中断的，广西军区最清楚。当我们组织开通火车时，他们马上下令各地民兵设卡检查，不许客货列车通过。我们清楚要通车才不会被整垮，

“钢联指”堵死了柳江大桥，在我的建议下，我们马上开通南线、北线的客货运输，许多司机、乘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愿报名出乘。结果都被民兵堵住了，列车只得退回来。我们反映给军管会，他们开始非常支持。但很快表示无能为力。

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

所谓“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

第二天，恰好本人二十大寿，学习班宣布了本人和王反修、李振岭彻底隔离检查。在柳州市那边，白鉴平、廖伟然也同样。金营长告诉我，本来没有我的，因为我态度恶劣，所以经韦国清主持会议研究，加上了。这个隔离很彻底，除批斗会之外，基本上我们三个与世隔绝，直到8月19日进了北京的监狱。

□ 2004·1·9

【史海钩沉】

何家栋与迄今未了的小说《刘志丹》案

· 高 瑜 ·

〔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李建彤（刘志丹胞弟刘景范的夫人）在一九七九年版的《刘志丹》序言中说：一九六二年夏天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事情前因后果还没有弄清楚，由理论权威（指康生）提出，就定了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刘志丹》小说自然成了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网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们以及我采访过的老干部们都进了黑名单，成了审查对象，这个黑名单有多长，据悉涉及到的将军就有一百多名。文革开始后，审查变成关押揪斗大批判，黑名单还继续延长。地质部因刘景范、李建彤的关系揪出了党组书记何长工、工人出版社除了责任编辑、社长，还拉出了全国总工会主席马纯古。全总书记处书记张修竹说，“李建彤及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文革中贾拓夫被整死，莫名其妙把彭德怀又扯进《刘志丹》案的黑爪牙，甚至我到陕北采访时给我带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几个。”——《开放》杂志编者〕

◇ 何家栋声音被封堵

我今天关注《刘志丹》案，原因是我尊敬的师长、《经济学周报》的老领导、总编辑何家栋先生，正是工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刘志丹》上卷的编辑和参与写作者。今年初我收到何先生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有关《刘志丹》接受邢小群女士访谈的定稿。这篇访谈不仅是中共历史上对这一重大事件详实的纪录，而且处处闪烁着先生思想批判的火花，到了访谈的结尾先生已收不住思想的洪流，打开闸门，对中共长期奉行的路线斗争和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批判，有理不在声高，先生的批判力度绝不在于言词的尖锐，而在于他对历史的彻悟，正因此先生最后一段话的每一句都值得我反复阅读，那对于我就像吮吸一个成熟浆果甜蜜的浓汁。我曾给先生打了几次电话，询问访谈何时见报，先生总是回答“找不到地方”。

非典过去，何先生又捎来《百年潮》今年第三期李原写的“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一文的复印件和先生读后写给邢小群女士的信，信的结尾先生写下十分动感情的话：“至今还把告发《刘志丹》小说当作功迹来炫耀，就未免太恬不知耻了。既然他们又发起挑战，我只好起而应战。奉陪到底。即使他们采取制裁手段，用各种媒体上封堵我们的声音，我们也要将真相公之于众。”我注意到先生最后将“我”改称为“我们”，作为学生，我自愿加入先生的行列来，才提笔写作此文。

何家栋是工人出版社的创始人。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他因为在地下党时有办报搞出版社的经验，被调入工人日报，担任工务科长兼报社工厂第一任厂长。

◇ 何家栋和《刘志丹》初稿关系甚大

何家栋当年还列了一部传记文学选题，这就是《刘志丹》。何家栋和刘志丹在政治生命上有一段情感交流。何家栋入党时，党组织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第一次讲的就是刘志丹的故事。一九三二年左倾路线强迫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走下终南山南下，全军覆没。刘志丹死里逃生，回到陕甘，重振旗鼓，陕西省军委书记高岗也从西安跑来和刘志丹一起重建红二十六军队伍，后又发展起来，打到陕北，将陕北、陕甘联成一片，全红了。一九三五年徐海东、程子华的红二十五军，也从陕南转移陕北，在陕南作战时将杨虎城派去联络的张汉民团消灭了，团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自称认识刘志丹也给杀了。他们不相信白军团长是共产党员，认为与之相勾结的红军里的人也一定是反革命，陕北执行左倾路线，据此要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全部抓起来。逮捕令送到刘志丹手里，他完全可以调兵自卫，先发制人，但他没有。反而主动投案，与那些人讲道理，结果这次肃反，杀了六七百人，把知识分子几乎杀光，要不是中央红军及时赶到，连刘志丹几个人的命也保不住了。何家栋说：“从那时我就记住了刘志丹，没齿难忘。以后列入选题绝非偶然。我想，即使李建彤不写，我也要写的。”

一九五六年，何家栋看到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给《星火燎原》写的文章，他的夫人地质部研究院的党委书记李建彤也与人合作写了一本小书《刘志丹在桥山》，于是决定由编辑王勉思前去组稿，并陪同采访，一九五八年冬天，初稿写出来了，工人出版社决定派何家栋去定稿。一九五五年审干中，何家栋的历史问题被查的一清二楚，从参加革命到解放，每一环节都找到证明人，党支部的结论是：“调查结果，调查出了个好样的。”过去的老战友，都说他是“干革命不要命。”但是五七年何家栋因出版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被说成两人“一拍即合”，也被打成右派。何家栋的情况向李建彤做了介绍，得到她的应允，同意何做《刘志丹》的责任编辑。

何家栋提出了一个方案，把主要事件串连起来，把次要人物合并起来，征得各方同意，他就帮助李建彤列出人物表，定出每章写哪些事，还商量好，文字风格，要用口语。句子要短，少用或不用“但是、所以、并且”一类虚词，根据拟定的大纲，整理出了《刘志丹》初稿，有二十万字，何与李又一边商量一边改，对人物评价和情节安排，常有不同看法，只要李建彤坚持己见，何家栋就听她的，因为她是作者。合并的人物都用假名，但都有原型，当事人一看便知从未瞎编过。

◇ 阎红彦向高岗争夺陕北创建之功

《刘志丹》写作中必须涉及两个大活人，这就是高岗和阎红彦。刘志丹与阎发生关系在红二十六军被肃反之前，一九三一年阎在山西搞了个游击队，在当地站不住脚，西渡黄河到陕北，只有二十七个人。和杨琪（后任红二十七军军长）的商贩军汇合到宝安县找到刘志丹。被领到南梁，和刘志丹的队伍汇合不久，阎红彦便在三甲来了一场火并，缴了刘志丹队伍的枪，把刘志丹的人杀了一批，夺了刘志丹的权，把刘景范也开除了。但阎红彦收拾不了摊子，省委又把谢子长调来当总指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总结边区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确定刘志丹、高岗执行正确路线，并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一条写进毛选三卷《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之中。高岗倒台后被删去名字，只剩下刘志丹等，看来延安整风并没有解决西北高干们的争斗。此时谢子长、刘志丹都已牺牲，只剩下高岗和阎红彦，一九四二年是高岗赢了，十二年后（高饶事件）他又输给了毛泽东。阎红彦借高岗完蛋也没打赢自己在陕甘的翻身仗，虽然屡战屡败，但是从来没有服过气，事隔七十年，阎也早已作古（在云南文革中自杀），但是他的代理人李原竟然今年在《百年潮》上称阎是“陕

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也不怕担当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看来无论生时死时打到阴间争的也就是这个。

《刘志丹》写了三甲火并，李建彤笔下留情书中没有提路线斗争，只提方法，“打伤了几个，开除一批，吓跑了一群，一来二去人员大减火，六七百人的队伍，一下子降到二百来人。”小说中把阎红彦还是当作英雄人物来写的，他的事迹概括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戴鸿远这个人物身上。但是因为把三甲源事件写成错误的，阎红彦仍要火冒三丈。

何家栋编写《刘志丹》，曾经采访过阎红彦本人。阎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到北京开会，住在前门饭店，他明确反对写《刘志丹》这本书，对陕北搅成一锅粥的路线斗争说得吞吞吐吐，只说：“写刘志丹不如写谢子长。”他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东西，抢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阎红彦说他的队伍成份好，纪律好，但是他说不清楚当年老百姓为甚么拥护“为害一方”的刘志丹，反对他这个为民除害的阎红彦。据说阎的队伍当年也抢东西，抢女人，谢子长负伤，也用鸦片治，没有别的药品。何家栋采访中对以上内容都没有追问，但是阎红彦说“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引起何家栋的反感。毛泽东上井冈山，杀了土匪王佐、袁文才。甚么时候提起，都表示遗憾，阎红彦只是一个省委书记，竟然后悔没有杀掉刘志丹，胸怀和革命感情都到哪里去了呢？

何家栋一生受迫害三十年，其中十四年是为《刘志丹》文字狱挨整，但到今天兴起此文字大狱的当事人仍为害人者狡辩。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李建彤将《刘志丹》校样交给途经北京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阎红彦，阎时任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书记，请阎提意见。

◇ 是阎红彦告的密

阎接到样书就发火了，立刻给李建彤回了一封信，只有两句话，“此书我不同意出版，应经过中央讨论。”李建彤也火了，稿子你不看就不让出版，岂有此理！两个人的力量当时是不对称的。阎一封信就把《刘志丹》告到中央，罪名是“为高岗翻案”，这封信是写给康生的，还是杨尚昆的，如今已被搅成一段公案。八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召开前夕，康生已通知出版社赶印《刘志丹》，送中央委员会审查，要每个中央委员一本。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京召开，阎红彦在小组会上大淌混水，给《刘志丹》定性。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上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会议上，为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所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明明是自己要推翻这两个会议中央已作出的结论，为自己翻案。却硬要诬陷小说刘志丹为十年后才倒台的高岗翻案，如此淌混水脚法，不经过中共党内长期不间断数路线斗争的磨练，是练不出来的。

八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阶级斗争时，康生递上一张条子。毛泽东念了一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就变成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的批语。据何家栋回忆，当天送审稿还没有送到他们手里。不但毛泽东没有看，康生也没有看。就在这次全会上定了“习贾刘反党集团”，《刘志丹》成了习仲勋篡党夺权的纲领。

八届十中全会刚结束，中宣部就向工人出版社派进工作组，让全社交待，听过习仲勋谈话的主编吕宁，编辑周培林和领导何家栋的杜映都要检查交待，全社压力最大的还是何家栋，他六十年代才摘掉右派帽子，现在马上要戴上反党帽子，和顾准一样变成了“双料人物”。就这样，

一张网络全国的文字狱开始了。

据说毛泽东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明的，但是文革开始时，对《刘志丹》的批示成了最具杀伤力的语录，它念到哪里，广播到哪里，写到哪里，哪里就要变成杀人的地狱，受尽凌辱的生命就要被夺去，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就被摧毁，被消灭。看来毛泽东已接受了批语的版权。

◇ 滴滴着鲜血的历史

一九六五年，康生发话，工人日报有坏人，组织不纯，《刘志丹》编辑是个右派。报社不敢怠慢，立即采取行动。全总的对口单位是山东，何家栋孩子的妈妈几年前因为右派问题已经下放到山东西南的威武县，工人日报社就把何家栋也弄到那里。

文革时康生还到地质部给群众讲话：“你们为甚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还算革命？”全国各地，立刻都贴满批判小说《刘志丹》的大字报。项目组还把没收的李建彤的采访记录交给红卫兵，让他们按记录上的名字，到全国揪人，一九六七年贾拓夫被整死在郊外。一九六八年一月八日，刘景范、马文瑞和李建彤同时被抓起来，马文瑞被关押了五年，习仲勋被关了八年，刘景范因反抗逼供揭了康生老底，便定为现行反革命，戴上手铐，逮捕入狱，坐了七年牢。李建彤被锁在地下室，悄悄开除了党籍，劳动改造。

文革一开始，何家栋被电报叫回北京挨批斗，和吕宁、周培林一起天天被拉出挨批，还挨打。批斗风过去，何家栋又被关回山东。家已七零八落，刚去山东时，老母亲一个人留在北京，因无人照料自己跑回汉南老家，山东的家里被洗劫，一无所有。何家栋被编入黑帮队种菜，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一件破棉袄，扣子都掉光了，就用绳子拦腰一束，像个叫花子。他十几岁的大儿子被打成内伤，死在郑州医院里，二儿子则长到十五岁在绝望之下自杀身亡。两个最小的孩子在山东跟着当右派的妈妈，经常被打，还不让上学，要不是老乡藏着他们，也被打死了。

一九七八年，工人日报复刊，何家栋才被调回北京，恢复党籍，整整三十年都在挨整，因《刘志丹》他在威武县共呆了十四年，一个字也没有写过。

◇ 《刘志丹》一波三折

文革一结束，李建彤就要求平反，习仲勋已经复出，还未分配工作。李建彤申诉，习夫人心有余悸：人刚出来，怕又折腾进去。中央发出了五十八号文件为《刘志丹》案平反。李建彤对稿子进行修改。何家栋也参加了，只出了上卷，就是工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的版本。只写到终南山失败。

一九八零年代李建彤听了一些老干部建议，对《刘志丹》又重写了一遍。她没有再找何家栋，写成三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据评论家评论，这一次路线斗争更突出了，之前有所顾虑的事，撕破脸，放手去写了。阎红彦已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作古。但阎派人马对三卷的《刘志丹》又告了一状，中央成立调查组，最后由胡耀邦决定停止发行，有关会议没有让李建彤参加答辩，与会人说了甚么，也未见公布，李建彤和一批陕北老干部向负责此事的习仲勋当面提出抗议，习息事宁人，始终以“团结为重”相勉。在处理《刘志丹》三卷本的冯文彬，胡耀邦、习仲勋相继谢世之后，阎红彦的代理人李原（原为云南省委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组长）撰文“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文章一开始便说这本小说经历了一个一九六二年被否定到一九八零年被肯定到一九八六年又被最后否定的过程。这是不实之词。何家栋担任责任编辑的工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刘志丹》上卷与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相继出版的《刘志丹》三卷本根本

不是同一个版本。阎红彦当年告状康生、毛泽东罗织出的文字狱就是工人出版社的《刘志丹》。八十年代中共发出的五十八号文件说《刘志丹》及作者和一切被牵连的人平反，至今仍然有效，怎么能瞪着眼睛胡说《刘志丹》最终被否定掉呢？如果这样，那场大文字狱也应被肯定。

何家栋先生在给邢小群的信中，对李原做了如下回答：“李原的文章，一言以蔽之，是阎红彦翻案活动的继续。说它难得，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当做光荣事迹宣扬的，不是别人强加的不实之词。文章有两个要点，撇清阎红彦和康生的关系，同时又表明向中央告发检举小说《刘志丹》，是经过杨尚昆，不是康生，完全符合原则，是他们的功绩。并认定《刘志丹》小说是为高岗翻案。关于这点，经谁手告发，无关紧要。我对阎红彦和康生是否一伙毫无兴趣，即使阎红彦是反康英雄，也洗刷不掉他作为告密者的耻辱。”关于第二点，当初定《刘志丹》为反党小说，就是以为高岗翻案做根据的。这就是说中央为《刘志丹》小说及所有人员平反是错误的，也就等于供认阎红彦确是这牵连最广，受害最深的第一大文字狱的制造者。李原要证明阎红彦一贯正确，但是我怀疑他是被自己制造的谎言迷误了。李原能指出《刘志丹》哪一条是为高岗翻案的吗，如果举不出来，他是否应该承担政治诬陷的责任？就是这次诬告，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稍有良知者，理应闭门思过，还有甚么脸面拿《刘志丹》小说人前说三道四。兹事体大，不得不辩，以正视听。

《刘志丹》文字狱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害人者和受害者的话语权力仍然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甚至超过为人诟病的工农城乡二元化差别。这也是当今中共传媒和出版社“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可鄙现象的原因。

◇ 何家栋与李慎之

进入九十年代，两位老共产党员，同时“破门而出”写起政治思想理论批判的文章，两个人的文章都占领了自由主义的至高点。这两个人就是李慎之和何家栋。何老说：“《刘志丹》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我对文学完全失去了兴趣。写个故事也说有甚么纲领，对一群疯子说你没疯，怎么扯得清！有甚么想法不如直接说出来，无非是变换下说话的方式。”

非常巧，李慎之、何家栋同庚，今年都过八十华诞。李先生竟然在非典时期溘然病逝，但他是被学者公认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何先生对他的评价非常高，我想信凡是读过《怀念李慎之》两卷集的人（这也是当今找不到书号和出版社，只能由写者自己掏钱集资出的书）都会对何家栋的纪念文章《未了的心愿》有卓然不群的评价，它即显示出李慎之先生思想的份量。我真不知道何老哪来的那么大的精力？一个患青光眼，只有一只眼保持微弱视力的老人，还有糖尿病，爬在小书桌上，用蝇头小楷汇聚成思想的江河。他还联系着那么多人，六四之后所有敢于表明立场的学人或被迫发不出吼声的朋友都与他有思想联系。何老与李慎之先生一样，是思想者，又是组织者，李先生与何先生交往不过四五年时间，何老说：“是他李慎之硬把我拉进他们那个学术沙龙的，参加者大多是学界中坚，也有我一类的老弱。”我想这四五年，未来会证明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何等的作用，他们共同致力的“公民教育”如今在学界有口皆碑，中国未来人的现代化他们是共同的基石，又是传薪者。

非典过后，中国这块多灾多难的上空仍然聚集着政治非典的乌云，而且越集越厚。最近又从现行体制传来对“舆论误导”的指责，命令不准议论“政改、修宪和六四”并要媒体学界收敛和自律。对于如此思想强暴，我只想引用何家栋先生的一段话：“一个国家里没有挑战者是十分危险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明明是一条死路，怎么无人大喊一声？前人留下的遗憾！就要后人否定它。谁搞‘凡是’墨守陈规陋习，就要连自己也被否定。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似乎还没有向良性方面发展而是向恶性发展，不是在进步而是在倒退。对舆论工具的管制比战时还严密，禁忌还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越改言路越窄，越改越神经脆弱，越怕听见不

同声音，竟改出一个文化恐怖主义，你说这个改革还有甚么盼头？”

这段话正是何先生对《刘志丹》文字狱的总结。

□ 原载《开放》杂志

~~~~~

### 【千秋功罪】

〔阎红彦在文革前夕告发“反党小说”《刘志丹》，导致一系列冤案，仅“涉及到的将军就有一百多名”，自己也没有逃过文革的劫难，真是千秋功罪，难与评说。——编者〕

### 阎红彦的最后岁月

• 李 原 •

1959年9月，阎红彦奉调至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11月起兼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 ◇ “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想急剧猖獗，席卷全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正式提出：“混入党里、政府里……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样，“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发展到“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

阎红彦给搅得越来越糊涂，抵触不满也在增加。因为他对这几个人都很了解，也很尊重。他们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人所共知。阎红彦私下斩钉截铁地说：“别的不敢说，要说他们反党，反对毛主席，我敢说，绝对不可能！”他心里纳闷，多次自言自语：“不知道林彪、江青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阎红彦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不可理解，这么尖锐、复杂，矛盾百出，你死我活、似党内又远非党内的“阶级斗争”。“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既不明说，又不布置，像是进了迷魂阵，怎么领导？”“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跟也错，不跟也错，进退两难！”

这些心里话，既不能明说，也无法讲清。就这样在困惑、迷茫、进退两难中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

他本人不得不以更多精力抓运动。他和省委的同志们商量，根据形势发展，把领导力量重新加以调整，组织大部分力量去照顾正常工作，主要是按计划抓好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他和一部分同志主管政治运动，去应付那些“以无知当武器”的“质询”、“责难”、“炮轰”、“造反”。

1966年8月间，阎红彦接到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通知，他非常高兴，满以为他这个中央候补委员有机会可以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决策，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下面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了。

出乎意料，会议发给大家的文件，是早已准备好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集中

赞扬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接着印发了林彪在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政变经的《讲话》。

再后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同时也是带头示范：“要在全中国展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才真正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发动群众、采用“四大”的办法，搞它一个天翻地覆，来解决多年来多次自上而下没能解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问题。所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央全会期间的一天晚上，实在耐不住了的阎红彦，去找当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把憋在心的话向老战友一吐为快。

廖志高和阎红彦谈到了许多迹象，两人具有同样的看法，并连连摇头，不断叹气。

阎红彦直率地提出：“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法，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

他们两个人都抓紧机会，在小组会上，坦诚而又注意措词地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他们的发言，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也惊动了最高层。

他们的忠言未能被理解，还为自己增加了艰险。

阎红彦怀着失望、迷惑、不安的心情回到云南。阎的夫人王腾波告诉我：回到云南的阎红彦已不像平常那样有说有笑。话少了，一个人沉思多起来。看得出，心情日渐沉重。

他有时讲起历史来：历代兴衰，出在“用人之道”。

说到这里，我给王腾波背诵了一段在小学就能熟诵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王听后，深沉地一再点头：“是呵！”

王腾波说：阎私下对她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说到这里，阎红彦很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

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 “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

8月23日，云南省第一次出现“炮轰省委”的口号。

那天，阎红彦刚从北京开会回到昆明，正在主持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突然传来“炮轰省委”的大喊大叫声……

由昆明工学院（冶金部直属高校）的一个学生、领头，煽动一大群来自不同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扛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目空一切地冲进省委大礼堂，点名要“阎红彦出来答复问题”。

如果是在过去，阎红彦定要痛斥这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可是现在，面对自己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莫名其妙”的“群众运动”，他只能竭力克制自己，无可奈何地宣布“会议暂停”，立即来到人群面前。面对缺乏社会经验的“娃娃”，他强忍反感情绪，耐心以理服人，并回答他们七嘴八舌提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问：“为什么毛主席18号在首都接见百万群众的时候，没有云南的同学，也没有西南的？”

答：“不要说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问：“你为什么不给大家介绍北京的和河北的革命经验？”

答：“我们去看了，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也有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没指示，我们也不好介绍！”

问：“炮轰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

答：“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有理’，‘横扫一切’，老实说，我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念的‘最高指示’里不是有这么一条吗：‘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他又说：“如果省委不执行毛泽东思想，当然应该轰！至于你轰得对不对，那还要看事实。”“如果是轰牛鬼蛇神，一定要我承认是革命的那也是不必要的。”“要说云南省委都是牛鬼蛇神，我现在还没有觉悟到那个水平。”

问：“对于毛主席批发的清华附中学生那一封信，您怎么看？”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毫不含糊地回答：“这封信确实把形势轰起来了！但是，它的内容，我不一定完全赞成。”

本来，大多数青年学生只是“响应号召”而来，图新鲜，凑热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却也没有想到，难不倒阎红彦，落了个“自讨没趣”。有的有些泄气，埋怨；有的气极败坏，乱甩大字报，企图挑起事端；有的小声咒骂阎红彦“老狐狸”、“老反革命”。纠缠了几小时，沮丧而去。

8月24日，针对“炮轰省委”的口号，立即出现了“保卫省委”的行动。

阎红彦也必须面对群众，回答问题：“保卫省委”是不是革命行动？你们支持不支持？“炮轰省委”是不是反动口号？你们为什么不反对？我们要和他们辩论、斗争，你们支持不支持？……

这可难坏了一向是“急性子”、“刚正不阿”的阎红彦。看到这么多人，在紧急、困难的时候，自发地出来支持省委，他内心里暗暗地感到快意，得到安慰，看作是对自己工作的最大回报。可是，他立即想到“中央的斗争”，“全国的形势”，和眼前看到的情况，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协调。运动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向哪里发展？他十分迷惑不解。内心的矛盾，思想感情的翻滚，使他十分压抑。

他站在群众的面前，坚定明快地说：“省委不怕炮轰”！接着又表示“也欢迎炮轰”。“你们提出要保卫省委，我们很感谢。但是希望你们不要这么提。因为不符合‘中央精神’，不符合‘斗争大方向’！”“希望你们不要去和人家辩论。那样会造成群众的对立，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乱；还要承担‘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

“我们也得跟上‘中央的步伐’呵！”他没能说服群众，更加忧心忡忡。9月份，昆明的运动进入了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辱骂声，“造反有理”的歌声，绞成一片。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搞“喷气式”，剃阴阳头，各种各样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侮辱人格，只要戴上“革命行动”的桂冠，公然肆虐，任意泛滥。但这个时候，闹得再凶，也还多半限于一部分大中学生和文艺界的少数人。

年近60岁的阎红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面对没完没了的纠缠，他很少顾及个人安危，总是发愁：“这个搞法，生产受损失，明年日子怎么过？”他心力交瘁，仍力求使局势不要失控，尽力维持省委的日常工作，管好全省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可是，自己却失去了正常生活。一天忙到晚，疲惫不堪，吃不下，睡不好。人们担心他的身体，劝他抽空休息一下。他总说：“吃这点苦，受这点累，算什么！”“最难的是我们这些人既要领导自己并不理解的运动，又要当这种运动的斗争对象。真难办呵！”

◇ “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

10月初，阎红彦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从10月9日开到28日。主要针对全国各地遇到的强大抵制与阻力，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求“必须转变立场”、“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群众中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阎红彦头脑昏沉，眼前一片混乱。他奇怪，他苦恼，像掉进了“迷运动阵”，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极力镇定自己，反复阅读《报告》、“讲话”，越看思想越乱，对林彪的讲话，仍然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会议期间，林彪指使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的老部下，“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江青、陈伯达一伙原以为，由这样一个人提供这样的“钢鞭材料”，会使人们哑口无言，不可能有人提供反证，就是有，有他们在场坐镇，谅也没人敢吭气，自然就成为“会议一致揭发”，就可以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

不料，此人的话音一落，刚正不阿的阎红彦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他指着坐在身旁、时任云南省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两位历史见证人的发言是过硬的，有力的。犹如当头一棒，把他们的如意算盘打乱了，把



阴谋戳穿了，会场沉默了，会开不下去了。

在场的江青、陈伯达如坐针毡，恶恨恨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

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从一位“四人帮”掌权时期的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资料柜中查出来的，资料上有明文记载。

接着，江青亲自出马，指使北京“红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增派力量分批南下，帮助云南迅速打开局面，“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揪斗阎红彦。当时，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已有具体表达。

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

形势发展得出乎意料的快，全城到处贴满大字报和标语：“打倒‘三反’分子阎红彦！”“舍得一身剐，敢把阎红彦拉下马！”“阎红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控诉大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激烈。

斗争升级了，火力更猛了。

阎红彦的身心受到了他革命一生中最残酷的折磨。他不顾高血压、心脏病，带病挨斗；有时甚至不能吃饭，不能喝水，斗争会接连不断一开就是一天。口干舌燥，还要不停地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无理纠缠。一不小心，还会陷入故意编织的圈套，“逼你犯错误”。

他一边挨斗，一边按照党的传统做法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始终坚守岗位，没有放松自己的领导责任。

三级干部会议无法正常进行，不断停下来被勒令去参加批斗大会。所以，会议从11月5日断断续续开到30日。我从头至尾参加了这次“三干会”及各种批判会，一直在阎红彦身边。

◇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

在“造反派”的狂呼乱叫面前，阎红彦像在大敌当前的战场上，大义凛然，昂首挺立，沉着应付，说理斗智，不卑不亢。

他坚持原则，保护干部，坚持党的政策。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也从来没有表态赞成把谁打倒。

每当“造反派”指名逼他下令“罢官”时，他总是耐心解释：“干部有缺点、错误，是个批评教育问题，

党的政策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全省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大家批评。”“动辄罢官，不是党的传统。”“干部是党的干部，也是党的财富，是由党组织管的，我个人无权撤哪个干部的职。”

他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坚持自己的基本观点，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他说：“对于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不理解”。“我们没

有认识到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动力，又要当作革命对象。”“也很不理解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运用‘四大’的形式，批判自己。”“所以，当时我们说过，省委是牛鬼蛇神，当然就应该轰，如果不是，就不怕轰，也轰不倒。”既说出了广大干部迷惑、疑虑、委曲、愤慨的复杂心声，也为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应对这种激烈、尖锐、错综复杂的局面，作出了示范和演练。

当时，“中央文革”通过“热线”，随时掌握着云南的情况。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听取红卫兵从云南“放火”回京的汇报。他们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不几天，北京街头就到处贴出通告：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已向红三司发出命令，要他们增派力量，支援云南。大批红卫兵，已陆续出发。

根据这一情况，云南省委立即开会，研究对策。阎红彦说：“北京派这么多红卫兵来云南干什么，不带几件血衣回去，他们能交了账吗？”他要求大家考虑周密一些，准备充分一些，防止有人制造借口，挑起事端，扩大事态。

大批南下红卫兵一到云南，就和当地造反派纠合在一起，挥舞起江青、陈伯达的“尚方宝剑”，煽风点火，狂轰滥炸。对阎红彦的批斗更集中，更频繁，火力更旺了。

有一天，阎红彦被轮番批斗了11个小时，晚上，又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在批斗间隙，一个小姑娘偷偷给阎红彦端来一碗荷包蛋，轻声地说：“阎伯伯，你赶快吃吧，这是妈妈让我送来的。”阎红彦一口也咽不下去，只能让孩子端回去。孩子说不出话来，望着阎红彦，眼泪顺着面颊直往下流。阎红彦抚摸着孩子的头，哽咽了。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秦基伟说，他这样做，因为一是“担心红彦同志的人身安全。他是省委的核心，如果他有三长两短，省委势必大乱”，二是“红彦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军区第一政委，他出了问题，我无法向中央交待”。

为了阎红彦的安全，并使他能得到一点休息，王银山全力以赴，尽心竭力，给他安排了几个“秘密”可靠的地方。可是，他都不肯去。

王银山怕阎红彦身体经受不住连续的批斗，一天，他找到了当时已转业到昆明市汽车公司工作的、自己原来的一位老驾驶员，要他以拉阎红彦去批斗为名，把阎红彦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这位驾驶员开了一辆大卡车，上面坐满了佩带红袖章的人，他们佯称是某个造反派组织派来的，冲进会场，抢出了阎红彦。在城里绕了几个圈子，在夜雾迷蒙中，把阎红彦送到了王银山的家里。王银山把阎红彦安排在楼上自己的卧室休息，自己则在楼下搭了地铺。

◇ “这个局面，我怎么能休息呢”

1967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面对社论，阎红彦估量全国形势，思绪和激情交织成一团，长时间一言不发。

1月2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大大小小100多个造反派组织，响应号召，“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在南下红卫兵的策划下，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对云南省委的“造反攻势”展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决定，1月4日傍晚，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阎红彦等省委领导人“必须”到会，“接受批判”。

1月3日，阎红彦主持，省委专门开会，进行研究：“去，还是不去？”阎红彦说：“要我去，我就去。”赵健民表示：“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多数人同意赵的意见，认为“不能去”。

省委为了避免发生群众斗群众的恶性事件，经反复研究，又请示北京。在没有任何答复的情况下，决定指派专人去做工作，力求说服造反派，暂缓召开批判大会。

1月4日，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不听任何劝阻，批判大会按预谋在昆明市中心广场召开了。

火药味十足的批判大会，一直开到夜间10点。阎红彦等省委领导人，也按省委集体决定，一个也没有到会。

造反派头子黄兆琪等大为光火，大骂阎红彦拒不接受他们的批判，并造谣说：“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把阎红彦藏到昆明军区大院去了”。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队伍高呼着“捉拿阎王爷，捣毁阎王殿”的口号，径直向昆明军区冲去。

听到这一消息，阎红彦十分焦急。他决心亲临现场，扭转局势。他说：“我去给他们讲明道理，说服他们撤出军区大院。”省委的其他领导人都不同意他去，说：“现在有理讲不清！”此时，秦基伟、李成芳也打来电话，劝他“千万不要来”，一切问题“由军区出面，设法解决”。

这时，阎红彦由于长时间被批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发昏，血压升高，心脏出现房颤，面色通红。大家都劝他暂时休息一下。他说：“这个局面，我怎么能休息呢？”

在座的同志们分析了形势，大家认为，省委领导人没有去军区大院，晚上，造反派很可能会来冲击省委，而且不知道要纠缠到什么时候。于是，异口同声地劝阎红彦：“我们轮流在这里盯着！你先去休息一下，哪怕一两个小时也好。否则，你的身体支持不住，怎么应付更长时间的激烈斗争！”

阎红彦沉默一会，点头说：“的确，我实际上也有点支持不住了，头也发昏。稍微休息一会儿也好。”他终于接受了大家的再三劝说。

1月4日，下午5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约十余公里的小麦峪。就是在这里，阎红彦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4天。

小麦峪，是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目。这是奉大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红彦安全的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内外都不能走漏风声。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始终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1月5日，是备受煎熬的一天。清晨，阎红彦一起床，就多次要求秘书电话联系，他要立即到造反派中间去做工作，要他们退出军区大院。

军区领导来电话了，告诉他，秦司令员已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政委和省委其他人都不在军区内，要他们撤走。他们根本不听，竟把小卖部搬进来，准备安营扎寨。军区已经组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接触。秦司令员强调：“现在情况极为复杂，工作由军区来做，阎政委千万不要来。”

省长周兴也出面作了工作。造反派是“重任”在肩，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什么也听不进去。周兴告诉阎红彦：“那里根本没有有组织的群众，乱哄哄像个自由市场。你去了根本无法做工作。你目前的身体状况那么差，绝对不能去。更何况去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夜沉沉，风呼啸。在阎红彦的执意坚持下，他的车子行进在夜色中，飞快地向市区驶去。但他不能进军区大院和省委办公楼。他只能在远处观察一下，在一个僻静的处所听了汇报。

省委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了，各式各样的造反旗子，在夜风中哗啦啦张扬。省委办公楼的门上、窗上、走廊里，到处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等大标语。省委书记们被冲得四散了，办公室被占领了，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也没处落脚办公了。“你想进去看一下，都不可能了。”

阎红彦听完汇报，只能跺脚，对天慨叹！

当晚，阎红彦和周兴只好又返回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的家被抄了。当天上午，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忽然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

赵健民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立即行动，按照赵的意见，很快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一个人留下来抵挡。

造反派大队人马，开着宣传车，直奔书记处办公楼而来。

赵健民从窗子里看到造反派爬墙而入，立即叫人把门打开，挺身而出，迎了上去。

他大声告诉造反派：“我是赵健民，阎红彦同志不在这里。”

造反派气极败坏，抓不到阎红彦，就将赵健民推上卡车，带到了昆明军区大院。

他们追问赵健民：“阎红彦到哪里去了？”

赵健民正气凛然，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但不能告诉你们。”

“你既然知道就带我们去抓他。”

“这不行。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商量、谈判、定几条，然后约个时间、地点，阎红彦和你们见面。”

“哪几条？”

“第一条，你们的人撤出昆明军区大院；第二条，阎红彦同志来后，不能进行人身污辱，

不戴高帽子……你们答应这几条，我一个电话他就来了。”

但造反派按照“群众专政”的逻辑，怒吼道：“不行！”

造反派集中力量逼着赵健民带他们去找阎红彦，被赵断然拒绝。赵说：“你们批判省委和阎红彦的缺点错误，不应该进驻军区大院。昆明军区是边防军区，是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你们用冲击军区这种手段逼迫阎红彦，我不赞成。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让阎红彦来同你们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话音刚落，造反派就大吵大闹，呼喊：“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赵健民的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成了造反派头头们蛊惑人心、煽动群众的口实。首先，黄兆琪用高音喇叭煽动说：“赵健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就是不告诉我们，怎么办？”接着就是几个人起哄乱吼：“戴高帽子！”“游街！”

马上，八个彪形大汉，蹬上了汽车顶篷，把早已准备好的高帽子，强行卡到了赵健民头上。赵健民伸手便把高帽子扯下来，撕掉了。

他怒发冲冠，厉声抗议：“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这是对共产党的污辱！”

恼羞成怒的造反派也乱吼：“这是对造反派的挑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抗！”“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疯狂者气极败坏，八个彪形大汉一齐动手，反扭赵的胳膊，强行按在车顶的行李架上，卡着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更加重了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摧残。

他们把一个年近60岁、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同志，扭胳膊、揪衣领，强行卡上高帽子，硬按在汽车顶的行李架上，沿昆明市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达3个多小时。

一路上，赵健民极力反抗，先后撕烂6顶高帽子，一路大声喊叫，大骂造反派“反革命”。“你敢骂毛主席的红卫兵？”“老反革命！”他们用力死死卡住他的脖子，不许乱动。直到把他扭伤，说不出话来。

造反派的这一“创举”，震惊全城。

从下午2点15分驶出的游街汽车，到5点30分才回到军区大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的赵健民，疲惫不堪，气息奄奄，被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治疗。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又把他抢出来，送到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经检查发现，赵健民的脖子已骨折。造反派不相信，要求自己派人检查。医院拒绝后，又进行了反复检查，结论依然是骨折，需住院治疗。

◇ “我就不承认你是在代表中央讲话”

1月6日傍晚，阎红彦和省长周兴一道，听取了王银山的汇报。当听到赵健民挺身抗争、被强行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时，他悲愤至极，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

1月7日一大早，造反派把大队人马开到了云南省军区，硬逼着军区领导立即交出阎红彦。直到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亲自出面，以38年党龄和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造反派才不得不快快离去。

阎红彦在省委、党政各部门、两级军区的保护和安排下，一面说服工人、干部、群众“保持克制”，“避免冲突”；一面就是不理、不见造反派，任凭他们四处抄抓。

1月7日下午3时左右，阎红彦亲自接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上交换了对当前工作的意见：阎红彦委托秦基伟负责筹备省委书记处会议，并确定开会的时间、地点。

下午8时左右，一辆军用汽车来到了小麦峪。

车上下来的，不是秦司令员，而是王银山和秦司令员的秘书。

秦司令员托秘书送给阎红彦一张字条：“红彦同志，情况有变化，我现在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阎红彦一惊，感到“情况不妙”，没想到形势这么严重。

秦的秘书汇报了昆明军区大院被冲击后的一些情况。王银山汇报了省委发往北京的电报，昆明军区已乱得无法发出去了，是经由云南省委发出的。

王银山接着又向阎红彦报告：“叶帅从北京打来电话，很关心你的安全。”

阎红彦眼睛盯着王银山，急切地问：“叶帅怎么说？”

王银山一字一句地详细作了汇报：叶帅问：“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安不安全？”王银山回答：“电话不保密，不好告诉你。”叶帅又问：“他身边现在都有些什么人？”王银山回答：“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叶帅问：“你们能不能绝对保证他的安全？”王银山说：“一定尽全力保证阎红彦同志的安全。”

叶帅指示：“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王银山不得不如实地回答：“他的家已经被抄了。”

叶帅难过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了电话。

老师的关怀，使他感到温暖和安慰，也使他体察到局势的严峻。

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沉重地说：“叶帅也管不住了！”接着，他催问书记处的会议准备得怎样了？王银山边说边画了两个开会地址方位图。一个是机场警卫部队驻地，一个是林家院子（监狱）。

阎红彦急切地说：“这个会，明天就开。”

想了一下，又说：“8号如果开不成，最迟9号开。开会地点，两个地方都可以，你征求秦司令员的意见，由他最后定了就行。”

这次王银山来小麦峪汇报，在场的还有周兴、王腾波、阎和周的秘书。大家谈到深夜12点钟，王银山和秦司令员的秘书才驱车回城。

阎红彦对王腾波说：“抽烟的人多，屋子里烟雾沉沉，我头都发昏了。你先去睡，我再溜达几步就睡。明天早点起来，还要开会。”

1967年1月8日，是阎红彦到小麦峪的第4天。

凌晨一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一拿起话筒，便听见对方气势汹汹，满口的福建土话。阎红彦不能完全听懂他说些什么，但听得出是一种斥责的口气：“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见不得风雨！”

阎红彦一听就十分反感，气愤地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对方就让汪东兴当翻译、转达：“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不要怕群众！”“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几次要回话，都被对方蛮横地打断了。

阎红彦实在忍无可忍，便和陈伯达在电话里争吵起来！

阎红彦像连珠炮，一口气几个“为什么？”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施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

“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陈伯达也不想听他讲些什么，只顾吼叫：“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阎红彦义正词严地予以申诉：“我就不承认你是在代表中央讲话！”

“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阎红彦说完，便愤怒地放下了电话。他一边走，一边骂：“他娘的，简直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开玩笑。”

“我们又不是怕群众。”阎红彦心头在剧烈的颤抖，实在平静不下来。他推开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去，到军区大院去！到造反派中去！

周兴劝他：“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子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休息。

黎明前，大约4点多钟，几天来都没法找到阎红彦的造反派，现在“根据可靠情报”，开着一队队汽车，朝小麦峪冲来。隆隆的马达声，嘈杂的人声，乱成一片。

门卫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

秘书接电话后，立即跑进房间，催阎红彦：“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见动静，就走了。警卫员又进去喊他时，打开了灯，发现阎红彦已停止呼吸！并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腾波，对不起，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被害？”“自杀？”都留下了令人难以琢磨的痕迹和疑点。小麦峪，像一个“仙境”，黎明前特别昏暗，迷漫在云遮雾罩之中……

眼前无法更改的事实是：阎红彦走了！含恨而去！

犹如战争中与敌人斗智斗勇，日夜周旋，一切都衔接得何等紧凑。

犹如“狼牙山五壮士”、“八女跳江”，和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刻，以身殉国，气壮山河。

犹如“中流砥柱”，宁为玉碎，抗击逆流。唤醒人间真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们尽可嚣张一时，一旦人心丧尽，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审判。

◇ “阎红彦是个好同志”

周总理知道阎红彦的死讯后，大吃一惊，茫然发问：“阎红彦真的死了？”

1月12日，他用专机把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和在混乱形势下专门负责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等人接到北京，亲自听取汇报。并沉痛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还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呀！”

王银山两次检讨说：“总理，我没有保护好阎红彦同志。”

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一个人是保不住阎红彦的。”

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会上，谭震林再也按捺不住，大发雷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赵健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阎红彦。阎红彦死后，又为阎红彦鸣不平，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他一再进京，面见康生，直言忠谏：“文化大革命不能这个搞法！”1968年1月21日，康生在京西宾馆当面蛮横地诬陷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40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他无中生有地咬定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铸成骇人听闻的“赵健民冤案”。

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再三直接过问下，阎红彦11年的沉冤得到昭雪。

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工作，在与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谈话时，就交代他放手使用老干部；要抓紧为阎红彦平反。

贾启允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委托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岳肖峡负责，由重回省委任副秘书长我协助，代省委起草为阎红彦平反的报告。不久，这个报告就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扭住不放的一个“罪证”。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根据对阎红彦的了解，听了多方面意见和对他死亡情况的调查，在1977年10月一次谈话中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好。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11月27日，由云南省委向中央上报关于阎红彦同志问题的结论报告。中央决定为阎红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且将阎红彦的骨灰移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正厅中区。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胡耀邦等380余人参加了仪式。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